



ICSL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2, No. 1, 2026, pp.118-124.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60112tfmri>



记忆的两副面孔——

伊拉·纳代尔《菲利普·罗斯：追忆马塞尔·普鲁斯特》评介

李思宇 (Li Siyu)

摘要：菲利普·罗斯曾宣称“塞利纳是我的普鲁斯特”，被认为是与普鲁斯特保持距离的宣言，伊拉·纳代尔的《菲利普·罗斯：追忆马塞尔·普鲁斯特》试图颠覆这一成见。该书通过考察罗斯藏书中的批注、小说中对普鲁斯特的直接提及以及两位作家传记材料的比对，论证普鲁斯特是罗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隐秘存在。两位作家在美学目标、童年经验、历史意识和犹太身份等层面呈现出丰富的共鸣，但在喜剧传统、种族灭绝历史和记忆诗学等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围绕这些共鸣与差异，纳代尔的论证究竟证明了“影响”还是“亲和”，仍是一个值得追问的方法论问题。

关键词：菲利普·罗斯；马塞尔·普鲁斯特；伊拉·纳代尔；影响研究；比较文学；记忆书写

作者简介：李思宇，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犹太文学，电邮：louisselibere@gmail.com。

Title: Two Faces of Memory: A Review of Ira Nadel's *Philip Roth: À la recherche de Marcel Proust*

Abstract: Philip Roth once declared that “My Proust is Céline,” a remark long regarded as a statement of distance from Proust. Ira Nadel's *Philip Roth: À la recherche de Marcel Proust* seeks to overturn this assumption.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annotations in Roth's personal library, direct references to Proust in Roth's fiction, and a comparison of biographical materials, Nadel argues that Proust was an indispensable yet concealed presence in Roth's work. The two

writers share rich affinities in their aesthetic aims, childhood experience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engagement with Jewish identity, yet diverge fundamentally in their comic traditions, the historical reality of genocide, and their poetics of memory. Whether the resonances and differences Nadel identifies ultimately demonstrate “influence” or “affinity” remains a methodological question worth pursuing.

Keywords: Philip Roth; Marcel Proust; Ira Nadel; influence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mory writing

Author Biography: Li Siyu,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E-mail: louisseli bere@gmail.com.

引言

1984年，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接受法国杂志《文学双周刊》（*La Quinzaine Littéraire*）访谈时抛出一句惊人之语：“在法国，我的普鲁斯特是塞利纳”。罗斯紧接着承认，“即使他的反犹主义使他成为一个卑劣的、不可容忍的人。要读他，我必须悬置我的犹太良知，但我还是这样做了”（Salgas, 1984）。伊拉·纳代尔（Ira Nadel）撰专论指出，塞利纳本质上“允许罗斯拥抱越界”，使他得以扩展自己对违反社会与性规范之主题的坦率书写（Nadel, 2025a, p.157）。换言之，这句话不仅是罗斯与普鲁斯特保持距离的宣言，更是一份关于文学越界的自白。然而，纳代尔的新著《菲利普·罗斯：追忆普鲁斯特》（*Philip Roth: À la recherche de Marcel Proust*, Palgrave Macmillan, 2025）试图揭示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即便罗斯公开宣称塞利纳是他的法国文学导师，普鲁斯特仍然是他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隐秘存在。纳代尔以传记写作享誉学界，此前已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大卫·马梅特（David Mamet）等文学人物立传。他曾出版《菲利普·罗斯研究指南》（*Critical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 2011）和传记《菲利普·罗斯：一种反生活》（*Philip Roth: A Counterlife*, 2021），对罗斯研究有着深厚的积累。

而2025年的这部新著，是一部专门处理罗斯与普鲁斯特之文学关联的比较文学研究，纳代尔通过考察罗斯私人藏书中的批注、小说文本的细读以及两位作家传记材料的比对，论证普鲁斯特是罗斯创作中真正不可或缺的存在。副标题“追忆马塞尔·普鲁斯特”显然是对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戏仿，正如普鲁斯特的叙述者追寻失去的时光，纳代尔也在追寻罗斯创作中那个被遮蔽的普鲁斯特。全书六章加上引言和结论，从美学目标、历史意识、犹太身份、喜剧风格、疾病书写到身后声誉，构成一幅细密的比较图景。以下从三个维度审视纳代尔的研究：他如何论证罗斯受普鲁斯特影响、他发现了哪些具体的相似性以及二者有何差异。

一、论证的起点：证据与方法

纳代尔的论证从事实出发，最有力的证据来自罗斯本人的私人藏书。罗斯拥有九部普鲁斯特作品，包括两个不同版本的《追忆似水年华》英译本。在其中一本的扉页上，罗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和“1955”的年份（Nadel, 2025b, p.2），这一年，罗斯从芝加哥大学获得英语文学硕士学位，这一证据表明，早在文学生涯起步之前，罗斯就已经拥有并可能阅读过普鲁斯特。然而，纳代尔诚实地承认一个悖论。在罗斯的自传性作品《事实》（*The Facts*, 1988）中，他回忆起芝加哥大学时期的生

活，写道自己带着“普鲁斯特式的颤栗”期待每天回到公寓，但也承认“连续两个夏天都没能读过《斯万之路》第60页”（Nadel, 2025b, p.3）。但是，一个从未读完普鲁斯特的作家，如何能被普鲁斯特深刻影响？纳代尔对此的回应颇具说服力：影响并不总是通过完整阅读发生。普鲁斯特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其技巧、主题和美学目标已经渗透进现代小说的基因之中，成为一种弥散性的存在。罗斯可能没有读完普鲁斯特，“但他完全吸收了普鲁斯特笔下的世界，以及他对社交礼仪、行为举止甚至性爱的描绘”（Nadel, 2025b, p.3）。换言之，纳代尔所遵循的是一种间接影响的逻辑：经典作家可以通过文化中介、批评话语、其他作家的转述而进入后来者的意识，不必以完整阅读为前提。更重要的是，罗斯小说中对普鲁斯特的直接提及并不罕见。在《解放的祖克曼》（*Zuckerman Unbound*, 1981）中，那个滑稽的阿尔文·佩普勒称内森·祖克曼为“新泽西的马塞尔·普鲁斯特”（Nadel, 2025b, p.xx）；在《我作为男人的一生》（*My Life as a Man*, 1974）中，祖克曼回忆自己在芝加哥大学时期与“欧洲大师——曼、托尔斯泰、果戈里、普鲁斯特”共眠的日子（Nadel, 2025b, p.4）。这些线索表明，普鲁斯特始终在罗斯的文学意识中占据一席之地，而纳代尔的策略是将这些零散的线索编织成一个连贯的叙事，证明罗斯对普鲁斯特的关注不是偶然的，而是持续的、深层的。

二、共鸣的维度：两位作家共享什么

在确立了论证的方法论基础之后，纳代尔展开对两位作家具体相似性的考察。这些相似性涵盖美学目标、童年经历、历史意识和身份政治等多个层面。

（一）“使可见”的美学目标

纳代尔认为，普鲁斯特和罗斯共享一个“使可见”（*rendre visible*）的美学目标，都致力于让日常生活中通常被忽略的经验在文学中变得可见、可记忆。“个体记忆的阐释和理解总是受到记忆的社会框架的影响”（颜成汛、肖建华，2025, p.325），对于普鲁斯特和罗斯而言，书写“地方”恰恰是这种记忆最直观的载体。普鲁斯特对贡布雷和巴黎有着近乎执念般的依恋，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教堂都被赋予了意义；而对罗斯来说，纽瓦克始终是他“文学想象的市政中心”，罗斯本人也承认，他“一直被描绘地方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所吸引”（Kimmage, 2012, p.24）。罗斯曾说：“这种对所处世界令人着迷的物质性的热情，几乎是每个美国小说家的核心任务：为每一件美国事物发现最动人、最具唤起力的语言描绘”，纳代尔则评论道：“如果稍作修改，普鲁斯特也会说出同样的话”（2025b, p.5）。这种对细节的执着也体现在两位作家对社会风俗的观察上。普鲁斯特笔下的巴黎沙龙是一个精密运转的社会机器，蕴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和身份政治。罗斯笔下的美国犹太社区同样如此，《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 1959）中的富裕郊区生活和《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 1997）中的手套工厂和石头屋，都是罗斯观察美国社会的棱镜。

（二）童年创伤：爱的否定

纳代尔发现，两人都在童年经历了某种形式的“爱的否定”（*the denial of love*）（2025b, p.5）。普鲁斯特的母亲有时会拒绝给予晚安吻，这一场景在《斯万之路》开篇获得了文学再现，被解读为对失去的焦虑以及通过写作重获失去之物的渴望。罗斯的童年经历与之相似，纳代尔引用了罗斯的精神分析师克莱因施密特（Hans J. Kleinschmidt）的文章：罗斯六岁时曾因与母亲争吵而被暂时赶出家门。克莱因施密特引用了普鲁斯特的一句话：“我们最终总是背叛母亲”（Nadel, 2025b, p.5），

这句话同时适用于普鲁斯特和罗斯：两位作家都在作品中反复书写对母亲的依恋、对母爱的渴望、以及最终不可避免的背叛或分离。这种对母爱的复杂态度延伸到两位作家对爱情的书写。普鲁斯特笔下的爱情几乎总是以失败告终：斯万对奥黛特的迷恋、叙述者对阿尔贝蒂娜的占有欲、夏吕斯与年轻男子的关系；罗斯笔下的爱情同样如此，从《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 1969）到《欲望教授》（*The Professor of Desire*, 1977），再到《垂死的肉身》（*The Dying Animal*, 2001），爱情在罗斯那里始终伴随着焦虑、背叛和失败。

（三）历史作为道德试金石

纳代尔还将视野扩展到历史维度。他认为，德雷福斯事件之于普鲁斯特，正如越战之于罗斯。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错误地指控为德国间谍，引发了长达十余年的社会撕裂。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德雷福斯事件成为检验人物道德立场的试金石：斯万因支持德雷福斯而被上流社会排斥，各种沙龙根据对此案的立场分化为不同阵营。越战在罗斯创作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美国牧歌》中，瑞典佬的女儿梅里因反对越战而成为炸弹袭击者的核心情节，直接源于越战对美国社会的撕裂。纳代尔写道：“德雷福斯事件和越战都是检验人物的试金石，揭示了表面共识下的深刻分裂”（2025b, p.35）。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作家都拒绝让小说沦为政治宣传。普鲁斯特甚至批评了那些以德雷福斯事件或战争为借口而不去“破译内心之书”的作家（2025b, p.35）。而在罗斯那里，尽管《美国牧歌》以越战为背景，但真正的主题是美国梦以及历史对个人命运的无情碾压。政治事件是背景，而不是主题；是触发器，而不是目的。

（四）犹太身份

纳代尔以安德烈·纪德的一段话：“在我们这个时代，法国有一种犹太文学，它不是法国文学，有其自身的特质、意义和特殊方向”（2025b, p.50），引出了犹太身份这个两位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普鲁斯特笔下的犹太人形象复杂而矛盾，纳代尔援引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普鲁斯特的分析：普鲁斯特阐明了“犹太人在非犹太社会中的脆弱地位”，福堡圣日耳曼的贵族能够容忍犹太人，是因为尚未将自己与街头喊着“杀死犹太人”的暴民联系起来（pp.58–59），而这种容忍本质是脆弱的。罗斯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战后美国犹太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流动，他们的焦虑不是能否被接纳，而是在接纳之后，犹太身份还意味着什么。罗斯对犹太社区的讽刺引发了巨大争议，他被指控为“自我仇恨的犹太人”，对犹太人民造成的“伤害”堪比“所有有组织的反犹主义机构”（Glenn, 2006, p.95）。纳代尔还指出两位作家笔下犹太身份与性别的关联：普鲁斯特将犹太性与非正统性行为并置，罗斯笔下的犹太性则与异性恋的激进性联系在一起。

三、差异与边界：比较的张力

纳代尔的著作并非只是罗列相似性。在展示两位作家共鸣的同时，他也触及了一些根本性的差异。这些差异为整个比较带来张力，也暴露出“影响研究”的内在困难。

（一）喜剧传统的根本不同

纳代尔开宗明义地写道：“喜剧饱和于两位作家的写作”，但两人的喜剧传统截然不同（2025b, p.70）。普鲁斯特继承的是欧洲喜剧传统：莫里哀的社会讽刺、伏尔泰的机智、拉辛的心理分析、拉伯雷的狂欢。他的喜剧往往隐藏在优雅的句法之下，读者需要停下来细细品味才能意识到其中的

讽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维尔迪兰夫人的描写，她自诩品味高雅，实际上充满了势利和虚伪，普鲁斯特从不直接批评她，而是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罗斯的喜剧传统则是美国犹太式的：莱尼·布鲁斯（Lenny Bruce）的单口喜剧、西德·凯撒（Sid Caesar）的电视喜剧以及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神经质幽默，一种直接、粗犷、把喜剧效果推到前台的风格。《波特诺伊的怨诉》就是典型例子，整部小说是波特诺伊在精神分析师沙发上的独白，充满了关于手淫、性幻想、犹太母亲的粗俗笑话。纳代尔一语中的：“普鲁斯特的喜剧隐藏，罗斯的喜剧揭露”（2025b, p.72）。这一差异不仅是风格的，也是文化的，普鲁斯特的喜剧根植于法国沙龙文化的含蓄与机锋；罗斯的喜剧则来自纽瓦克犹太社区的粗犷与自嘲。

（二）种族灭绝历史的有无

种族灭绝历史的存在与否或许是两位作家之间最根本的历史差异。普鲁斯特写作于纳粹主义兴起和欧洲犹太人遭受系统性灭绝之前，他笔下的犹太人面临的是社会排斥和同化压力，而非系统性的种族迫害与灭绝。在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对这一历史创伤的文学再现已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母题，对“犹太人个体和集体的巨大心理创伤”的书写俯拾即是（卢虹宇、方英，2025, p.231）。菲利普·罗斯的创作始终笼罩在这一历史创伤的阴影之下，构成其犹太意识与叙事伦理的核心底色。纳代尔指出，种族灭绝元素在罗斯作品中“无处不在”：《鬼作家》中的艾米·贝蕾特可能是幸存的安妮·弗兰克；《夏洛克行动》直接处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以及种族灭绝历史记忆的政治化；《反美阴谋》则想象了一个法西斯化的美国，犹太人再次面临迫害。这一主题在普鲁斯特那里不可能出现，因为历史尚未发生。这一差异对两位作家的记忆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普鲁斯特而言，记忆是个人的、美学的，通过非自主记忆重获失去的时光，将逝去的经验转化为艺术。对罗斯而言，记忆则带有伦理的紧迫性，不仅是个人的回忆，更是集体的见证。《遗产》的最后一行：“你不能忘记任何事”，可以被视为罗斯整个创作的座右铭（Nadel, 2025b, p.133）。

（三）身体作为监狱与身后声誉

纳代尔在最后两章讨论了两位作家的疾病书写和身后声誉。普鲁斯特从九岁起就患有哮喘，一生都在与疾病抗争，晚年几乎足不出户，在软木隔音的房间里写作。罗斯同样被疾病困扰，他的后期小说几乎可以被看作身体衰败的编年史，《凡人》（*Everyman*, 2006）、《垂死的肉身》、《复仇》（*Nemesis*, 2010）都以不同方式书写疾病、衰老和死亡，“对罗斯而言，身体是一座绝对的监狱，没有释放或假释可言”（Nadel, 2025b, p.97）。但两位作家对待身体的态度有所不同。普鲁斯特倾向于将疾病转化为一种美学资源，正是因为身体的脆弱，记忆和写作才变得如此珍贵；罗斯则更为直接地面对身体的衰败，没有太多美学的升华，只有冷酷的记录。两位作家的葬礼也形成对比。普鲁斯特于1922年去世时，艺术家们纷纷赶来为他画像，葬礼当天巴黎交通为之停顿，詹姆斯·乔伊斯也出席了葬礼；罗斯的去世则更为低调：2018年在纽约去世，非宗教葬礼在巴德学院举行，只有受邀的朋友参加（Nadel, 2025b, p.120,125）。

（四）“影响”还是“亲和”

在展示上述差异的同时，一个方法论问题也随之浮现：纳代尔的论证究竟证明了“影响”还是“亲和”？影响研究的范式要求证明因果链条，即A导致了B的某种变化。但纳代尔的大量论证实际上展示的是结构性的相似：两位作家都书写地方、都经历了母爱的否定、都关注犹太身份、都以

历史事件为道德试金石。然而，相似性本身并不等于因果关系。正如宋德发在讨论影响研究的信用危机时所指出的，“文本比对的考证仅仅是研究的起点；倘若所谓的‘影响’缺乏在读者层、批评界乃至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被接纳、讨论与转化的可靠证据，那么任何基于相似的因果推断都可能沦为一种平行发展或共同原型的巧合，而非真实的影响轨迹”（宋德发、毛俊桐，2025，p.141）。纳代尔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难题。他的回应是：罗斯“完全吸收了普鲁斯特的世界”，影响可以通过文化中介而非逐页阅读发生。这一论点有其说服力，但也使“影响”的概念边界变得模糊：如果一个作家可以在没有完整阅读的情况下被另一位作家“影响”，那么“影响”与“时代精神的共振”之间的界限何在？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纳代尔这部著作的贡献不在于证明了一条从普鲁斯特到罗斯的因果链条，而在于勾勒出一个丰富的共鸣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两位作家以各自的方式回应了现代小说的共同难题。这种共鸣本身就是比较研究的合法对象，不必依赖“影响”的因果逻辑来获得正当性。

结语

在结语中，纳代尔引用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一句话来概括两位作家的共同关切：“我就是我记忆中的自我”，对“记忆的追寻，都成了他们永恒的追求”（Nadel, 2025b, p.136）。但普鲁斯特的追求是“记忆的复活与召回”，罗斯的追求则是“不要忘记”（Nadel, 2025b, p.133），这一区分回应了本书在“影响”与“亲和”之间的张力：即使两位作家的共鸣最终不能被归结为直接的因果影响，他们在记忆问题上的不同取向本身就构成了富有成效的比较对象。普鲁斯特和罗斯都是“记忆中的自我”的书写者，都致力于通过文学捕捉那些构成自我的、易逝的经验，但他们的动机、方法和最终目标各有不同。米兰·昆德拉曾在与罗斯的对谈中说道：“遗忘是人的重大私人问题：死亡作为自我的丧失。但什么是自我？它是我们所记得的一切的总和。因此，死亡真正令人恐惧的不是失去未来，而是失去过去”（Roth, 2002, p.97）。普鲁斯特和罗斯都深谙此理，他们毕生的写作，都是与遗忘的抗争，尽管方式不同，目标却相似：让那些即将消逝的经验在文字中获得永恒的形式。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i Siyu ^{ID} <https://orcid.org/0009-0009-3466-2401>

References

- Glenn, S. A. (2006). "The vogue of Jewish self-hatred in post-World War II America. *Jewish Social Studies*." *Jewish Social Studies* (03): 95-136. DOI: <https://doi.org/10.1353/jss.2006.0025>

Kimmage, M. (2012). *In history's grip: Philip Roth's Newark tri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adel, Ira (2025a). "Lawless Exuberance: Céline and Roth."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01): 157-173. DOI: <https://doi.org/10.2979/jml.00114>

Nadel, Ira (2025b). *Philip Roth: À la recherche de Marcel Proust*. Palgrave Macmillan.

Roth, Philip (2002). *Shop Talk: A Writer and His Colleagues and Their W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Salgas, Jean-Pierre(2017年12月12日):“Les lectures de Philip Roth”, URL.

卢虹宇、方英（2025）：“符号·行动者·本体：辛西娅·欧芝克《大披巾》中的物叙事”，《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02）：225-233。

[Lu, H., & Fang, Y. (2025). "Thing narrative in Cynthia Ozick's *The Shawl*."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02): 225-233.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05>]

宋德发、毛俊桐（2025）：“影响研究就是拉郎配吗？——以史学考证为基底的比较文学研究信用危机论”，《国际比较文学》（04）：127-144。

[Song, D. & Mao, J. (2025). "Is the method of influence studies a sort of random coupling? On the crisis of credibilit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ased on historic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04): 127-144. DOI: <https://dx.doi.org/10.19857/j.cnki.ICL.20258408>]

颜成汛、肖建华（2025）：“文化研究的世界视野和中国立场——评陶东风《创伤记忆与见证文学》”，《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02）：323-332。

[Yan, C. & Xiao, J. (2025). "The global vision and Chinese posi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A review of Tao Dongfeng's *Traumatic Memories and Literature as Testimony*."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02): 323-332.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15>]